

我與王芃生先生的關係

蔡培火

記得是民國二十三年、四年（亦即是日本大正二十三、四年）時候，我在東京以新民會（是以在東京留學的台灣青年為基礎，由常住東京或常來東京的台灣人前輩如林獻堂、蔡惠如等所組織的團體）為背景，創辦了台灣青年月刊雜誌社。同時亦開始作台灣議會設置運動，每次日本帝國議會開會都連署提出請願書。東京有一家極具盛



本文作者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蔡培火先生近影。

名的出版社，名叫岩波書店，其主人岩波茂雄，此人極有義俠氣概。我用日文寫了兩本書，一本名『告日本國民書』，另一本『東亞之子如斯想』都是批評日本政府的惡政，而他竟敢接受出版。因此就跟他成爲好朋友，常到他的辦公室作客，他辦公室牆掛了一幅中堂，寫了四個大字『坐鎮書城』，其下款署名是『王大楨』。他的辦公室牆上另有一幅山水畫，書只有王先生這一幅而已，我料想一定有特別的意義，所以問他這位王先生是什麼人。他就鄭重地告訴我說，王先生是中國駐日大使館的參事官，人品很好，對中日的關係很有好的見解，說他很欽佩王先生的遠見與爲人，因此我雖沒有機會在東京瞻仰王先生的風采，却一直留有很好印像在我的心裏。

其後日本國內溫和派被整肅了，急進派以軍人爲中心把持政權，對中國政策急趨惡化，到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發生，國民政府決定全面抗戰到底，繼而演變成爲太平洋戰爭，八年後日本支持不住而投降了。

當日本敗像顯現的時候，殘存的日本溫和派

如伊沢多喜男、後藤丈夫、安部磯雄等，因我曾著書『東亞之子如斯想』，勸告日本不可與中國爲敵，日本政府拘我欲陷我於罪，這些人却曾從旁代我解釋，終獲無罪而被釋放。而今日本之敗像已露，這些明智之士苦思找尋與中國和解之路，乃保證我到中國大陸試看，我出發前明告他們，因時機太遲難有希望，他們總以爲試看爲好。

因此我就在民國三十二年春由長崎坐船抵達上海。有一位日本衆議院老議員名叫田川大吉郎者，因爲他在日本政界是主張與中國和平相處的，日本急進派早就要整肅他，所以他早我一年就先逃來上海居住，他與我同是基督徒在東京同一個教會，他又是對台灣議會設置運動熱心支持，他在上海是受一位韓國工業家基督徒支持其生活，我抵達上海就是先依靠他而受那韓國工業家的照顧，過了將近一個月後，就有台灣同鄉接我到他家裏去住了。

嗣後日本在中國大陸的戰況雖然還是保持優勢，但是中國政府決心抗戰到底，絕無談判可能，迨珍珠港偷襲以後，美國決心奮戰，日本在南

洋的戰況一直不利，甚至台灣、沖繩、日本本土都受美機轟炸，日本的敗像畢露了。

到民國三十四年五月間，却有一位吳旭初青年約三十歲左右，會說閩南語的福建人來見我，說他是重慶中央派來的人，他說中央命令他要接亡命在上海的田川大吉郎晉重慶去，要我協助他一道同行，因為他不通日語，我問何故要田川晉重慶呢，他說大概是要田川在重慶廣播勸日本政府早日放下武器投降，或是要聽田川的意見作參考。

我想這很重要，我馬上答應同行訪問田川老

人（大約已過七十），田川一聽到這話沒有思慮迅口就答應了。還是我問吳青年路程遙遠，旅途的安全以及路費有無安排，吳旭初說一切沒有問題，旅途處處有人接應，要什麼就有什麼，一切都安排好可免掛心，這樣我們三人就在六月底由上海搭火車先到杭州。

田川是改穿黑紐的便衣褲，好像一個南方的鄉下佬，我三人到達車站時竟然有人送給三張火車票上車，車達杭州站的時候亦有人在月台接待，送我們到一家相當宏大的公館住宿，有此表現，我與田川已經完全信任吳青年，由他照料一切。

晚飯後吳旭初提起通過防衛線時有相當危險，是否日本守兵輕輕放行沒有把握。對此點田川老人微笑說他有把握，可免介意，他說駐杭州的日本總領事恰好是他的親戚，他料可以平安地通過。

翌晨田川單獨去駐杭州的日本領事館訪問，用過中餐才回來，說，明晨總領事的坐車要送我們三人過防衛線去參觀之江大學及六和塔。果然翌晨總領事的汽車來接了，我們三人上車，汽車開到衛兵站崗的地點，司機與衛兵交談幾句話，我們就無事通過防衛線了！！

我們沒有到之江大學也沒有參觀六和塔，我們在離錢塘江岸不遠的地方就下汽車，那裏已經



王克生先生（中立者）早年與自日本護送銅像至南京之日本友人合影。 國父

有人接應亦有一部轎子給田川老人坐，我們不休息馬上向江邊走，到一處有船在等着，我們即刻上船向錢塘江的中流淳安鎮逆流進行。我們還沒到淳安，在船上就知道日本已經投降了，在八月下旬我們在淳安上岸，有人傳達要我們在淳安待命，原本是要從此地陸路到福建省的建甌坐飛機飛往重慶的，而今日本已經投降，建甌已經沒有飛機起飛。我們在淳安靜候二十多天後，突然接戴雨農將軍招待請田川及我吃中飯，席上戴將軍親告要田川與我折返南京，聽命於何總司令應欽的指示以定行止。吳旭初再帶田川與我依原路折返到南京已是九月底了，新見一位負責接應田川與我的人，就是羅克展先生，由羅先生引晉拜謁何總司令，另外加了一位日文翻譯鈕先銘先生，何將軍表示很客氣，請田川老人再等一個時候才能決定行止。因日軍乖順投降，全部遣返日本沒有問題，我們承受優厚的招待，靜候到十月下旬，何總司令方才召見田川與我宣告，沒有事了不需晉入重慶，由田川老人選擇要暫留中國，或即回日本由他自己決定，中國政府必以優禮招待，不與一般日本人同樣待遇，田川表示要趕緊返回日本。我本人則向何總司令請求，准我單身晉重慶向中央致敬，或應中央對台灣情形有所垂詢，幸蒙總司令特准賜我軍機座位，我乃於十一月下旬飛到陪都重慶，在飛機場已有舊知的台灣朋友相迎，就到那朋友家裏住了幾天。

我的台灣舊友原來就是王其生國際問題研究所長的得力部屬，我亦由這朋友的說明，方才知道這位王所長就是我在日本東京所欽仰的王大楨

先生！當我的朋友帶我到國際問題研究所拜訪王所長，不知道何故——諒是王先生亦對我的生平略知一二，所長對我雖是初次見面表示不尋常的懇談，並道及因種種關係，前在東京未能互相直接談心為憾，又以極自然的美意囑我那台灣朋友，即日將我的行李搬送到會家岩的王公館，要我作他的客人——其生先生的寬宏大度，明眼人實在使我五體投地！我一直在王公館作客將近四個月之久，我自己很想在重慶的事辦完就儘速歸回台灣，無奈其生先生的雅意難却，他說他不久也要到上海，勸我與他同機離開重慶，因此一延再延到三十五年的二月下旬才同機飛抵上海，飛機

的座位也是由其生先生給我的。

我在台灣就是今日亦是同樣不願問舍求田，當時更是一個浪人，所帶盤費無幾，若不是幸遇其生先生如此寬宏厚道，我那時將不知道如何才好，由今回憶真是千謝萬謝！！

我在王公館的時間那麼久，天天只是看書遊玩不是辦法，我幾次向其生先生請求給我一點事做，先生因我累次請求，也就數次給我中文的講稿翻成日文，先生每次復看後都過獎說高手高手。有時候先生亦曾帶我拜訪前輩吳稚老、或于右老院長，後來聽說福建籍秦望山先生對於院長有提起我在台的作為，因此我於三十五年一月在重

慶入黨，即被任命為台灣省黨部的執行委員，是以于院長的推舉所致的。

最後我需再說出一件王其生先生賜給我的恩賜，這件恩賜不是財寶地位，是一位至好朋友邵毓麟先生，我這位好朋友是在重慶會家岩王其生公館，王其生先生親自介紹而互相認識的，自從那時以後我們倆真是志同道合無所不談的好朋友，後來我的內人也是邵兄夫婦的熟朋友，現在我們兩家的交情，恐怕是在台灣本外省間最親近的關係罷！我說我們的這種關係，就是王其生先生的恩賜，邵兄一定是同意我的！！拉拉雜雜說了一大堆自己的事，以此來記念王其生先生第三十年的忌辰，實在有點不對題，敬請原諒罷！

編輯報告

編者

△革命先進，黨國元老吳稚暉（敬恆）先生，畢生行誼，關係國家民族綦鉅，本誌本期特隆重推出名教授謝康博士所撰「憶『吳老頭子』稚暉師」，謝教授的大作，對吳稚暉先生的志事與平生以及吳先生對中華民國教育文化上的重大貢獻，有抽絲剝繭，鞭辟入裏的報導與分析，使讀者閱讀本文後，有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親切真實感，詢是懷舊憶往篇章中，極為難得的佳作。

△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化學院教授鄧文儀將軍為中外雜誌寫「我與同

志好友戴笠」，憶述中國現代情報組織的源淵，以及革命英雄戴笠將軍與鄧將軍本人在革命領袖 蔣公耳提面命之下，致力安內攘外工作的許多珍聞秘勿，既富教育意義，更有史料價值，值得一讀再讀。

△近五十年來，國人對於五四運動，新文學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始終弄不清楚，許多人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因此李霜青教授特為撰寫「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一文，交由本誌發表，李教授遍訪當年親身參與五四運動的學人，並蒐集史料，廣徵博引，

實為當今談五四與新文化運動作品中的上乘之選。

△名作家費雲文先生的「戴雨農其人其事」本期已連載完竣，費先生的這一篇力作，可謂為戴將軍的一篇完整傳記，同時也是在集戴將軍生平珍聞軼事之大成。本期付印時又收到有關憶述戴將軍的佳作，本誌自當精編精校，隆重推出，以就教於讀者諸先生。

△名作家，總統府國策顧問蔡培火先生，為紀念愛國學人、國際問題專家王其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特親撰「我與王其生先生的關係」，交由本誌發表，蔡先生的大作，情文並茂，着墨不多，已將王其生先生寬宏大度的學人風範，寫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顯見蔡先生在落筆之前，曾經用過不少的心力。